**停止谋杀语言**

约翰·里奥

如果大家对文字游戏于社会和政治斗争的重要性还有所怀疑，就听一听德里克·汉弗莱的话吧。汉弗莱是安乐死运动的领军人物，他说去年秋天在华盛顿州的民意调查中他们一方失利，主要就是输在语言战争上。安乐死合法化的支持者只是宽泛地探讨如何“帮助死亡”，但汉弗莱说媒体和公众却“饶有兴致地使用自杀以及安乐死等大词，因此119提案未获得通过。”

同时，汉弗莱也指出“帮助死亡”在意义上具有模糊性：“它可以指任何事情，从医生执行死亡注射一直到握住濒死病人的手说‘我爱你’，因此任何一个随意拉伸这个短语的意义以使其涵盖谋杀和道义支持两层含义的人都是文字游戏的大玩家。”

实际上，这在快速增长的语言操控领域是一个大趋势，特定术语正让位于更宽泛更模糊的词语。“盲人”或“基本失明”由“视觉障碍人士”所代替，而这包括所有戴眼镜的人。“虐待儿童”现在似乎包含父母或看护人可能做错的一切事情。“滥用药物者”（以前称作瘾君子和酒鬼）现在则包括滥用或误用任何东西的所有人。威廉·卢茨是《双言巧语评论季刊》的编辑，他说，“整个世界都是由物质构成的…这样说并不能提升讨论的清晰度。”

更为经常的是，词义发生延伸只是由于争辩性的缘故。“家庭”词义延伸之后，那些非家庭也得以享受诸多的家庭福利。现今，“家庭”这个词可以用来泛指群租者、无子女的夫妇甚至是独自居住的单身人士。为规避城市区域规划的限制，两组居住在新泽西州樱桃山、正处于恢复期的酗酒者坚称他们是一家人。有位发言人就说，“有居民认为他们自己是一家人，但在国内没有其他家庭是需要宣称或者解释自己是一家人的。”如同《爱丽丝漫游仙境》中一样，说话者想表达什么意思，这个词就是什么意思。

词义拉伸的另一种流行的方式就是将一些低等级的抱怨跟一些等级较高、隐含暴力的抗议相连结，因此就可以让人们因吃惊而引起注意。《华盛顿邮报》的一位专栏作家最近抱怨说在华盛顿特区的公立学校正在发生“知识灭绝”，他的意思是说老师们教得不好，而学生们连基本技能也没有学会。贝蒂·弗莱顿经常抗议媒体“对女性的象征性灭绝”，而她要说的是媒体上由女性撰写以及关于女性的新闻故事还不够多。曼哈顿有位男士身患艾滋病而生命垂危，说他的死亡应当看作是“某种形式的政治谋杀”，他要表达的是布什政府应该更多地投资于艾滋病的防治工作。

这些文字拉伸游戏并不仅仅是吸引眼球的夸饰，有时候它们是特意将小的冒犯提升为大的过错。比如向女性抛媚眼，过去一般认为是没有恶意的或者仅仅是有些无礼，但现在则认为是性骚扰，经常同强奸相提并论。我们注意到明尼苏达大学对性骚扰的定义已经模糊了扫视、不够敏感、严重骚扰以及强奸等词语之间的界限：“性骚扰既可能像强奸一样突显也可能如一瞥那样微妙。骚扰经常是由对女性体验的麻木迟钝构成的。”

从言语上将性骚扰整个类别都归结到强奸罪是一直都存在的。心理学家约翰·高特曼对《纽约时报》说，“性骚扰就是一种轻微的强奸罪。”《纽约每日新闻报》专栏作家卡罗尔·阿古斯则对读者说，“性骚扰就是强奸罪的小类，预示着敲诈勒索。”

更为宽泛的定义总是模糊各个类别之间的界限。比如“家庭暴力”这个术语，以前是指家庭内部身体上的攻击，现在则还包括精神上的虐待。蕾妮·沃克是这个领域内的专家，她在定义殴打妻子时将威吓和操纵也包括在内，如“伤害女性的自尊，让女性做她们不愿做的事。”与此相仿，有些对约会强暴的定义则扩展到包含“心理上的压迫”，可假定包括哄骗劝诱以及恳求做爱等等。

类似的语义模糊也出现在仇恨犯罪领域。我们经常不清楚我们讨论的是暴力还是非暴力，是罪行还是没有犯罪倾向的事件，是严重的社会犯罪还是轻微暧昧的口角。巴尔的摩的国家反歧视反暴力研究所一直在为媒体提供校园“种族暴力”的数据，但是它在定义暴力时将诽谤、涂鸦以及对怠慢的感知都包括在内，比如“我跑去跟一位黑人谈话，但他的朋友一直盯着我看，好像她不希望我在那儿。”这种策略的效应在于提高大家对于校园暴力的警觉，但也让我们对这些数据拥有者的目标和方法表示怀疑。

在非暴力事件中总是使用暴力语言反映出当今各个种族以及不同性别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将细微的事件跟重大的袭击相联系，让每个人都对犯罪保持全天候的警觉，又可能会夸大这些紧张关系，这正是我们为那些有争议的文字游戏所付出的代价。

**古代希腊**

希瑟·M·坎贝尔

在所有源自欧洲的印欧人当中，希腊人最先拥有先进的文化，并在文化发展方面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城邦制的国家**

希腊的地理位置及自然特性在其文明的发展上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毗邻大海这一特点吸引着希腊人到处游历探索，但是他们生活在岛屿或半岛上，或者是被大陆山脉分割的山谷中。这一事实使得他们只能在从其他地方难以到达的狭小地区建立国家。政治发展上的这个重要个性也体现了希腊人的性情。尽管它阻碍希腊成为一个能够与中东君主政权相抗衡的统一的国家，但是它促成了城邦的建立。城邦不仅仅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不仅仅是一个行业中心，一个与遥远地区开展贸易的中心；它首先是一个组织严密、自治的政治和宗教社区，其居民做好了为维护自由而牺牲的准备。殖民地也源自个别城市，采用独立城邦的形式。权力的融合以城市同盟的形式出现，例如伯罗奔尼撒同盟、提洛同盟和比奥提亚同盟。这些同盟的功效主要取决于主导城市（斯巴达、雅典或底比斯）的统治权，但是其他城市要求自主的愿望不可能被永久压制，同盟也就一再破裂。

**成就非凡的民族**

但是，希腊人一直觉得自己属于同一民族。他们性格相同，语言相同，而且只信仰一种宗教。此外，伟大的体育竞赛和艺术比赛具有持续更新的统一作用。希腊人才思敏捷，善于抽象思维，同时具有灵活的想象力。他们相信灵与肉的统一，并以这种信仰的形式形成了平和且激发美感的世界观。他们的诸神只是通过逐渐成型的神谱学松散地联系在一起。希腊宗教中没有与探索精神相对立的启示或教义。

在天文学、年代学和数学领域，希腊人从其他国家的知识和成就中获益匪浅。但是，正是通过他们天生的能力，他们才取得了最伟大的成就，成为欧洲哲学和科学的创始人。他们在再现艺术和建筑学上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就。他们追求完美的、自然主义的艺术表现。这一追求在人体雕塑上得到了全面体现。另一项重要成就就是有柱神殿的发展达到更为和谐的程度。希腊人的天赋创造了诗歌的形式和内容，而这些形式和内容一直是欧洲文学永恒的灵感源泉。

**政治发展**

希腊人强烈的政治意识产生了不同的政体。从这些政体中，他们的政治学理论提取了至今仍在使用的宪法类型。总的来说，希腊的政治发展遵循了一个模式：首先是早在迈锡尼文明时期的国王统治，然后是封建时期贵族地主的寡头政治，最后是不同程度的民主。通常情况下，有些时期，一些个人夺取城市政权，成为僭主。更为广泛的社区成员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这一趋势产生了自由民主的公民，但是，这并没有触及希腊社会和希腊经济所依赖的奴隶制度。

尽管内部纷争不断，但是希腊人成功地抵挡了亚洲专制政治的威胁。波斯人于公元前490年和公元前480至479年向欧洲的推进因为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的抵抗而失败了。希腊文明在公元前五世纪达到了顶点。雅典的古典时期及其伟大成就留下了持久的印象。但是，政治分歧，尤其是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争斗，日渐削弱了希腊人的政治力量。

**希腊影响**

直到公元前四世纪被马其顿人征服，希腊人才获得新的重要地位，代表了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及其继承者创建的所谓希腊帝国的文化影响力。殖民统治的新制度广为传播，远至印度河的城市社区都仿照希腊原型。总的来说，希腊教育和语言在世界上日渐重要。

通过成立亚该亚同盟，希腊再次声称独立。该同盟最终于公元前146年被罗马人打败。 希腊文明的精神随后对罗马产生了巨大影响。希腊文化成为罗马帝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和它一起传遍欧洲。当基督教教义在中东出现时，希腊人的世界观对其精神上的演变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罗马帝国分裂后，东罗马帝国的统治权落到了希腊人手里。他们的语言成为了官方语言，其使用扩大到了巴尔干地区。以希腊人为核心的拜占庭帝国保卫欧洲，抗击来自安纳托利亚的潜在入侵者，直到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沦陷。

**沉思录**

马克·奥勒留

我之所以为我，不过是一堆肉、一口气和一股控制一切的理性。丢开你的书本！不要再被书本所困惑，那是不可以的。要像一个垂死的人一般，轻视那肉体——那不过是一汪子血、几根骨头、神经和血管组成的网架。再看看那一口气，究竟是什么东西——空气而已，还不是固定的一口气，每分钟都要呼出去，再吸进来，剩下来的是理性；要这样想：你是个老年人了，不要再做奴隶，不要再做被各种私欲所牵扯的傀儡，不要再令他怨恨现世的命运，并且恐惧未来的命运。

…

一般人隐居在乡间、在海边、在山上，你也曾最向往这样的生活；但这乃是最为庸俗的事，因为你随时可以退隐到你自己心里去。一个人不能找到一个去处比他自己的灵魂更为清静，尤其是如果他心中自有丘壑，只消凝神一顾，立刻便可获得宁静，所谓宁静亦即是有条不紊之谓。充分地利用这种退隐的方法，使你自己得到新生。你内心的宗旨要简单而切要，拿来应用要立刻能解除烦恼，回转来时对原有的事物不再有何恚意。

你对什么怀有恚之意呢？是不是人心太坏？你心里要这样想：理性的动物是为了彼此互助而生的，忍耐便是公道的一部分；做错事都不是本愿的。试想在此以前，多少人于度过仇视、猜疑、嫉恶、甚至拔刀对杀的生活之后，不都是已经死去变成灰尘了吗？请想一想这桩子事，你最后便不复有什么恚了。

你是对整个宇宙中你所分占的一份觉得不满吗？要想想宇宙只有两个解释：一个是有神主宰一切，一个是原子的因缘凑合。我们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说明‘宇宙是像一个国家组织一般’。是不是肉体方面的苦恼总是抓住你不放呢？你要这样想：人的心灵一旦收敛起来，并且发现其力量之所在，便与实际生活中的顺利与坎坷全无关系。还要想想：你所听到过的与服膺过的有关快乐与苦痛的种种道理。

是不是那个无聊的东西——名誉，使你不能忘怀呢？试看，一切事物多么快的就全被遗忘！过去与未来是什么样的一片空虚！赞美之辞是何等的虚妄！对我们恭维的人是如何的善变与缺乏判断！这一切活动的场所又是如何的狭小偏隘！整个的大地不过是一个点，我们走动的地方更是何等渺小的一个角落！其中能容得多少人？称赞你的人又是何等样的人？

所以从今以后，你该退隐到自己那块小天地里去，不要过分紧张、不要急躁，要从容自持，要像一个人，一个有人性的人，一个公民，一个尘世凡人，那样的去面对人生。但是最方便的宗旨当中，有两项你要注意：第一，客观的事物并不能涉及灵魂，只是在外面静止着；烦扰皆由内心而起。第二，眼见的世界瞬息万变，然后趋于消灭；要不断地想念你自己亲见的有多少事物在变。“宇宙即变化，人生即主观。”

…

铲除“我是受了伤害”的观念，受伤害的感觉立刻就消灭了，铲除那感觉，伤害立刻也就消灭了。

…

要像一块岬角的岩石，任凭那海浪不断的冲击；但是本身屹立不动，四周汹涌的浪涛不久就消沉下去了。“啊！我的运气不好，竟遭遇到这样的事！”不，应该这样说：“我好幸运，虽然遭遇这样的事，我并未受伤，既未被现状所粉碎，对将来亦无恐惧。”因为类似的事可能落在每一个人头上，可是并不见得每一个人都能不受到它的伤害。为什么认为那是不幸？而不认为这是幸事呢？无论如何，你可曾见过一个人的不幸，而不是由于他背叛了他的本性？凡不是与人性的意志背道而驰的，你会认为那是人性的变态吗？那么，你已经知道什么是人性的意志了。你还认为你所遭遇的事真的会使你减少一点点的公正、高尚、纯洁、明智、戒慎、爽宜、谦逊、自由以及其他人性所不可或缺的德行吗？将来如有任何事情使得你觉得受了伤害，你不可忘记这句格言：“没有一桩于不幸的事，不可由于勇敢承当而变成为幸事。” (梁实秋译)

**被恐惧与敬畏掩盖的壮美**

理查德·坦西

米开朗基罗（米开朗基罗·波纳罗蒂, 1475-1564） 远比拉斐尔要复杂得多，他的作品也不像这位稍许年轻的同辈的那样具有典型的盛期文艺复兴的特征。他脾气暴躁，对待自己和别人的缺点都一样没有耐心。他嫉羡拉斐尔，厌恶莱昂纳多，和赞助人们总是龃龉与冲突不断。也许引发这些个人问题的是他对艺术强烈而坚定的爱，因为他总是埋头沉浸于手头的工作中。他与艺术创作融为一体，密不可分，面对竞争对手的指摘，他常常不胜冲动，愤不择言。在这一点上，米开朗基罗常被拿来与贝多芬作比，但他们的个人信件中都流露出对亲近之人的深切同情与关怀，他们的作品都渗透着对人文精神的深刻领悟。

无论性格如何，米开朗基罗的事业实现了文艺复兴的一切理想，这些理想被视为兼具“天才”和“通才”的特征。他的作品有多纳泰罗作品般的大而威。他对自己的才能信心无限，完全听任才能的要求来做决定，而这些决定往往与赞助人的要求背道而驰。他深信唯有天分才能成就百世流芳，也深信唯有不断学习才能成就一番事业。

虽然身兼数职 ── 建筑师、雕塑家、画家、诗人和工程师，但是米开朗基罗始终以雕塑家自居，他视雕塑家之职高于画家，认为雕塑家具有“创造人类”般的神奇力量。他十分认同柏拉图的观念，认为艺术家双手所创造的形象一定来自艺术家的内心 ── 因此，艺术家的任务首先是观念，然后才是真实。但是艺术家并非观念的创造者，相反他们需要到自然界中去发现观念，对艺术家而言，最不容置疑的观念就是“美”。强烈的柏拉图式倾向使米开朗基罗通过文艺复兴时期流行的自然模仿论揭示出了隐藏于自然的崇高真理。尽管引导米开朗基罗之手的从来都不是一套完整的、一致的理论，但其大体在其诗歌里可见一斑：

*尘世凡间仰望之美*

*最似天父造人之理想世界*

*我的双眼渴望美物*

*我的灵魂渴望救赎*

*既然无力升天*

*唯有沉思美物*

米开朗基罗发现，一个艺术家必须从寻找观念开始。形象就像观念一样被禁锢在石头里，因此，只有通过移除多余的石头才能将观念释放出来。他将观念释放出来，就像皮格梅隆赋予其雕塑以生命：

*没有一种心灵的意境为杰出的艺术家不能在白石中表白的，然而只有遵从智慧引导之手才能达到... 去掉多余的边边角角 ... 从高山硬石中唤出鲜活的形象，其... 随着边角凿去而变得愈发鲜活。*

*米开朗基罗觉得，艺术家经年累月地致力于这一永不停息的呈现过程，“悟得崇高而新颖之形式时已是残年... 所剩时日无多。”*

米开朗基罗确实悟得了“崇高而新颖之形式”, 他在一个重要层面上彻底摆脱了束缚着前辈和同辈的经验 ── 他不相信数学是产生美的保证，他认为测量和比例都必须“依靠眼睛”。乔尔乔·瓦萨里曾引述米开朗基罗的说法，“尺子在眼睛里而不是在手上，因为手上的工作要靠眼睛的判断 ”。因此，米开朗基罗根本不顾维特鲁威、阿尔伯蒂、莱昂纳多、阿尔弗雷德·丢勒以及其他人对数学的强调，声称艺术家只有依靠灵感才能获得完美的比例。另外，米开朗基罗还坚持，艺术家不能受到束缚，除非是出于观念的需要。米开朗基罗强调艺术家对自身权威的肯定，这种观点预示了现代艺术家的产生 ── 他们拥有自我表现的权利，并且其天才只受到自身判断的限制。天才当勇超藩篱，富于想象，这一观念使得米开朗基罗的建筑、雕塑、绘画都偏离了盛期文艺复兴的正常轨道 ── 他的作品往往复杂、古怪，且体量巨大，以悲壮豪迈之势赫然于眼前，极富表现力和冲击力。米开朗基罗孤独而暴躁的个性，桀骜不驯的独立态度令意大利人有些无所适从，他们在谈到这个无与伦比的时代巨人时发明了一个特殊的字眼 ── ***terribilità***（慑人的力量）。人们对他的恐惧和敬畏甚至掩盖了他的光芒。

**多种选择的困境**

丹·艾瑞里

公元前210年，在中国，项羽带领他的部队渡过长江，向秦朝的军队发起攻击。夜里，部队在岸边宿营。第二天早晨大家一觉醒来，大吃一惊，他们的渡船已经被人放火烧掉。将士们跳了起来准备战斗，不过，他们很快得知放火烧船是项羽的命令，并且他还下令，让士兵们把行军锅都砸碎。

项羽对部下说，渡船和饭锅都没有了，他们只有打败敌人才有生路。这种做法尽管没能给项羽在中国历代名将录中赢得一席之地，但是对他的部队却起到了巨大的动员作用：他们手执长矛，挽弓搭箭，奋勇向前，势不可挡，取得九战九胜的战绩，彻底消灭了秦军的主力。

项羽的故事之所以不同寻常，是因为它与人类的正常行为是完全相悖的。正常情况下，我们无法忍受不留后路的想法。换句话说，如果处在项羽的位置，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会分出一部分兵力去守护渡船，以备万一战败撤退时使用；我们还会留一些人负责伙食，以备战事拖长，需要打上几个星期；我们还会安排人寻找稻草，捣碎了制作纸卷，以备在打败秦朝军队后（尽管当时看来不大可能）签署受降文书。

在当今世界的背景下，我们仍然竭力为自己保留各种选择余地。我们买的是可扩展式电脑操作系统，以备万一需要在上面装那些最新的高科技附加功能；我们给等离子高清晰电视买保险，以防出现黑屏；我们让孩子学习各种课程 --- 体操、钢琴、法语、园艺，还有跆拳道，以防某个课程激发他们的兴趣；我们购买豪华的运动功能汽车，不是因为我们真的想到野外驾驶，而是因为万一我们下了高速公路，轮子可以有足够的高度不至于损伤底盘。

我们往往可能认识不到，无论哪种情况，保留余地的同时我们也放弃了别的东西。结果是我们的电脑里有很多功能根本用不到，音响系统的保修费又高又多余。说到孩子，在让他们把一大堆活动都体验一下的同时，我们和他们都放弃了时间 --- 以及他们可以在某一方面确有所长的机会。我们为了一些不一定重要的事情疲于奔命，却忘记了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下功夫。这是一种傻瓜的游戏，但是我们偏偏玩得异常熟练。

在门与门之间奔忙是人类的一种奇怪行为。更加奇怪的是我们的一种冲动，驱使我们去追逐毫无价值的选择 --- 那些几乎消逝的或者对我们不再有价值的机会。我们有多少次买下了打折商品，并不是因为真的需要，而是因为一旦打折结束，这些东西卖完了，我们再也找不到这样的价格了？

如果我们认识不到某些事物已经成了消失的房门，需要我们当机立断去珍惜，那么这场悲剧的另一面就来了。例如，我们在工作上加班加点，却没想到爱子和娇女的童年正在一天天消逝。有些时候，这些“门”正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在关上，我们甚至觉察不到。例如，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说起他婚姻生活中最幸福的一年，那时他住在纽约，妻子住在波士顿，只有到了周末才能团聚。在此之前，他们虽然同住在波士顿的家中，但是每到周末，两个人却各自忙于自己的工作，而不是享受彼此的温馨。一旦改变了生活的安排，双方都知道只有周末才属于他们，良辰苦短，归期（返程列车的时间）已定。滴答的钟表声提醒着时间的流逝，所以整个周末，他们充分享受彼此的温馨，而不是忙于工作。

我并不是在鼓吹为了用全部时间陪伴孩子而放弃工作，或者为了改善夫妻生活故意选择两地分居（尽管这样做可能有所裨益）。不过，给自己设置个内在警钟，在一些最重要的“门”即将关闭时提醒我们，难道不是很有好处吗？

**象山一样思考**

奥尔多·利奥波德

一个发自肺腑的低沉的嚎叫在悬崖之间回荡，最后划过大山，消逝在远方深沉的夜色中。这声嚎叫爆发出一种充满野性和反抗的哀愁，爆发出对世界上一切逆境的蔑视。

每一种生物（可能也包括许多死去的生物）都侧耳倾听着这声呼唤。对鹿而言，它提醒了众生之道，意味着死亡近在咫尺；对松树而言，它预见了午夜的混战和雪上的血迹；对狼崽而言，它意味着有残肉可食的许诺；对牛仔而言，它意味着银行透支的威胁；对猎人而言，它意味着獠牙对子弹的挑衅。然而，在这些明显而又迫在眉睫的希望和恐惧的背后，还隐藏着更深层的只有大山自己才知道的含义，因为只有它活得最久，久到足以客观地倾听狼的嚎叫。

尽管如此，那些无法领会其中深意的人，也知道它就在那儿（因为在所有狼出没的地方都能感受得到它的存在）并使那些地方有别于其他地区。它令所有夜晚听见狼嚎以及白天追踪狼迹的猎人感觉背脊发凉。即使没有听到狼嚎或是看到狼迹，也可以从许多异样的情景中感知一二：驮马半夜的撕叫、岩石滚落的声音、逃亡之鹿的突然跃起以及云杉树下阴影的姿态等。只有那些不堪造就的新手才无法感知狼的存在，感受不到大山对狼群的秘密看法。

从我亲眼目睹一只狼死去的那天起，我就对此深信不疑。我们当时正在一个高高的崖顶吃午饭，山脚下的小河水流湍急，蜿蜒曲折。我们看见一头鹿在白色齐胸的激流中涉水前进，当时我们就是这么认为的。当它朝着我们爬上岸，抖动尾巴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那是一匹狼。另外还有六只，显然都是幼狼，它们从柳树丛中跃出，一个个摇着尾巴，撕打嬉闹着，加入到了欢迎的打闹之中。一群狼就在我们所在崖顶的山脚下，在平坦的开阔地的中央，着着实实地翻腾打滚。

那些日子里，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谁会错过杀死一匹狼的机会。很快，一发发子弹射入狼群。然而我们太兴奋了，无法精确地射击：怎样从陡峭的山崖向下瞄准始终是令人困惑的。当我们将猎枪子弹打空之后，那匹老狼倒下了，而一只幼狼拖着条腿躲进了山崩造成的无法通过的岩石堆里。

我们来到了老狼的身边，刚好来得及看到它眼中的绿色凶光渐渐熄灭。我当时就意识到，此后也明白了，在那双眼睛里，有我未曾领会到的道理 --- 某种只有它和大山才懂的东西。我当时还年轻，老是手痒痒地想扣动扳机，我以为狼少就意味着鹿多，以为没有狼的日子就是猎人的天堂。但是在看过狼眼中绿色火苗的熄灭之后，我感觉狼和大山都不赞同我的这个观点。

从此以后我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又一个州开展灭狼行动。我观察过许多新近形成的无狼山区的面貌，看见朝南的山坡被鹿群新踩出的迷宫一样的小径弄得皱巴巴的。我看见每一株可食用的灌木和幼苗都被啃食，先是衰弱不振，接着就死去。我看见每一株可食用的树木，马鞍鞍头高度以下的树叶都被吃光了。这样的一座山看上去就好像有人给了上帝一把新的大剪刀，并且禁止他做剪枝以外的任何事情。最终，被寄予厚望的鹿群因为自身数量过多而饿死了，它们的尸骨与死去的鼠尾草一起变白，或是在高大的杜松树下腐烂。

我现在怀疑，如同鹿群活在对狼群的极度恐惧之中，大山也活在对鹿的极度恐惧之中。或许大山的恐惧还有更好的理由，因为被狼群杀死的雄鹿只需两三年就有新的鹿取而代之，而被太多的鹿毁坏的山脉则可能几十年都无法恢复原貌。

牛群也是如此。消灭了自己牧场里的狼的牛仔没有意识到，他正在接管狼的工作，即把牲畜的数量控制在牧场可承受的范围。他还没有学会像大山一样思考，所以我们才会有沙暴，而河流也将未来冲入了大海。

我们都在努力追求安全、繁荣、舒适、长寿和平淡。鹿用的是它灵活的腿，牛仔用的是陷阱和毒药，政客用的是笔，我们大多数人用的是机器、选票和美元。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归结到同一件事上，即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在这个方面取得某种程度的成功是件好事，或许也是客观思考的前提。但是，长远看来，过量的安全似乎只会带来危险。或许这就是梭罗的格言“世界的救赎存在于荒野”的隐含意义。或许这就是狼嚎中隐含的意义，对此大山早已知晓，人类却少有察觉。

**公众对科学的态度**

斯蒂芬•霍金

不管我们喜欢与否，在过去几百年中，我们所处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变，而在接下来的一百年中，还可能会发生更为巨大的变化。有些人想要阻止这些变化的发生，回到在他们看来更纯洁更单纯的时代。但是过往的历史告诉我们，过去并没有那么美好。对少数特权阶层来说，情况并不是那么糟糕，但是即使他们也要面对没有现代医学所带来的问题，对女性来说，生育有巨大的风险。而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生活是肮脏、野蛮的，生命是非常短暂的。

无论如何，即使我们想把时间拨回到更早的时候，这也是无法做到的。因为知识和技术不会被轻易遗忘，也没有人能够阻挡科学在未来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即使政府给予科学研究的所有资助都被取消，在竞争推动下，科学技术依然会取得进步。更何况，那些热爱探索的人士喜欢对基本科学进行思考，不管他们得到报酬与否，没有人能阻止他们。要阻止科学进一步发展的唯一方式是建立一个对任何新生事物都加以压制的全球性的集权政权。但是人类的创造力和主动性顽强无比，即使是这样的方式也不会奏效，它最多只能减缓变化的速度。

如果我们承认我们无法阻止科学和技术去改变我们的世界，那我们至少可以尽力保证科技所带来的变化是朝正确的方向发展。在一个民主社会里，这意味着公众要对科学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这样他们能够做出明智的决定， 而不是完全让专家说了算。现今，公众对科学的态度充满矛盾。一方面，他们希望科学技术的新发展所带来的生活水平的稳定提高能得以延续。另一方面，他们又不信任科学，因为他们对科学知之甚少。在实验室里创造科学怪物的疯狂科学家这种卡通形象很好的体现了这种不信任。但是同时公众对科学是有很大兴趣的， 尤其是天文学。像《宇宙》这样的电视系列片和很多科幻小说都有大量的拥趸，就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应该如何利用这种兴趣给公众必要的科学背景知识，以让他们能够在像酸雨、温室效应、核武器、基因工程能问题上做出明智的决定呢？显然，最根本的还是在学校教育。但是现在学校里老师教授科学的方式单调乏味。孩子们为了通过考试死记硬背，他们感觉不到科学和自己周围的世界有什么关系。此外，科学课上会用到很多方程。尽管用方程来解释数学观念简洁而准确，但它们让普通人敬而远之。科学家和工程师用方程来表达他们的想法，因为他们需要知道非常精确的数量值。 而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对科学概念有一个质的了解就可以了，这用语言和图表就可以做到，并不需要方程式。

在学校里学到的科学知识可以给我们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但是现在科学发展的速度太快了，在我们离开学校以后，科技还总是会不断有新的进展。我在学校里就没学过分子生物学和晶体管方面的知识，但是基因工程和计算机是最有可能改变我们未来生活方式的两大技术发展。科普书籍和杂志上的科技文章可以介绍这些新的进展，但是即使是最为畅销的科普书籍，它们的读者也只占总人口的九牛一毛而已。只有电视能够影响大量的受众。电视上有一些非常优秀的科学节目，但是很多节目都把科学奇迹当成魔法来展示，没有对它们进行解释，没有把它们放到科学观念的框架中进行说明。科普电视节目的制作人应该认识到他们有责任对大众进行科普教育，而不仅仅是为他们提供娱乐。

在不远的未来，公众需要对什么样的科学相关问题做出抉择呢？ 迄今为止，最为迫切的是核武器问题。其他像粮食供应或温室效应这样的全球性问题发展相对迟缓。但是核战争一旦爆发，那地球上所有人类生命在几天内就毁灭了。冷战结束后，东西方紧张的关系趋于缓和，对核战争的担忧从公众的意识中消退了。但是只要这些可以毁灭世界所有人口很多次的武器还存在，那危险就依然存在。在前苏联各国，在美国，核武器依然把北半球的所有大城市作为攻击目标。只需计算机出现一个错误，或者一些操控核武器的军人发生叛乱，全球核战就会爆发。更让人担忧的是，一些相对来说的小国也在发展核武器。这其中的危险并不在于这些国家实际拥有的核武，因为他们的核武器虽然能杀死几百万人，但还是比较初级的。真正的危险在于，两个小国之间的核战争会把拥有庞大核武库的核大国卷入其中。

公众应该意识到这种危险，并且向所有政府施压，让它们大量削减核武，这非常重要。完全消除核武库也许并不现实，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减少核武器的数量来减少危险。但即使我们能够避免核战争，还有其他能毁灭人类的危险因素。有人讲过一个残酷的笑话：我们之所以还没有接触到外星文明，那时因为文明发展我们这个阶段就会把自我毁灭了。但是我对公众的理性有充分的信心，我认为我们会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富兰克林自传（节选）**

本杰明·富兰克林

接着我上了街，四处观望，当我走到市场时，我遇见了一个手拿着面包的男孩。以前我曾经我几次把面包当饭吃。问过他面包是从哪儿买来的以后，我立即跑到他指点给我的在第二街的一家面包铺那里。我要像我们在波士顿买的那种硬面包，但是好像在费城他们不做这种面包。接着我就要三便士一个的面包，他们也说没有。这样，由于我没有考虑到也不知道货币价值的不同，不知道费城的物价较低，也不知道他铺子里面包的名称，我就请他给我三便士任何种类的面包。于是，他给了我三个巨大的面包卷。这个数量让我感到很惊讶，但是我收了下来。因为我的口袋里装不下，我就两个腋下各夹着一个，一边走，一边嘴里吃着一个。

我就这样沿着市场街走去，一直走到第四街，经过后来成为我岳丈的里德先生的门口。我未来的妻子这时恰巧站在门口，看见了我，觉得我的样子十分尴尬可笑。事实也真是这样。接着，我转了一个弯，走过板栗街和一段胡桃街，一路走一路吃着面包卷。又转了一个弯后，我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市场街码头我来时的那条船附近。我跑到码头上喝了一口河水。吃了一个面包卷后，我的肚子已经饱了，我就把剩下的两个给了跟我们一同坐船沿江来的妇人和她的孩子。他们正等着开船继续前行。

体力恢复后，我又跑到街上去了。这时，街上有许多衣着整齐的人都在向着同一个方向走着。我加入了他们的队伍，这样我被带到了市场附近一个巨大的教友会会堂。我在他们中间做了下来。我四下看了一会儿，听不见有人说话。由于头天晚上的劳累和睡眠不足，我感到十分困倦，于是就睡着了，一直睡到散会。这时，有人善意地叫醒了我。因此，这个会堂是我在费城踏进过或者睡过的第一间房舍。

午饭后，困意重袭。他们给了我一张床，我和衣倒下，一直睡到晚上六点。他们叫我去吃晚饭。当天晚上，我很早就上了床，一直酣睡到第二天清晨。接着，我把自己打扮得整整齐齐地来到安德鲁·勃拉福的印刷铺。在铺子里，我见到了我在纽约遇到的那个老人，安德鲁的父亲。他是骑马来的，比我先到费城。他把我介绍给了他的儿子。他儿子很客气地接待了我，招待我吃了早饭，但是说他目前不需要帮手，因为他最近刚添了人手。但是城里有一家新开的印刷铺，老板叫凯莫，或许他可以雇用我。

那位老先生说要和我一起去见那个新印刷铺的老板。当我们找到凯莫时，勃拉福说：“朋友，我带了一个年轻的印刷工人来见你，或许你正需要这样一个人。”凯莫问了我一些问题，给我一个排字架看我如何工作，接着他说：虽然他一时还找不到事情给我做，但他不久就可以雇用我。凯莫从未见过老勃拉福，把老勃拉福当成了镇上一个对他有善意的市民，开始大谈他的业务现状和未来规划。我站在一旁，听到了他们的全部谈话，立刻看出他们中间有一个是一只狡猾的老狐狸，另一个只是一个新手。勃拉福把我留在凯莫处，自己走了。当我告诉凯莫那位老人是谁时，他大为惊讶。

这时我开始认识了城里一些爱好读书的年轻人。我和他们一起度过愉快的夜晚。靠着自己的勤奋和节俭，我赚了一些钱，生活过得十分惬意。我尽可能地忘掉波士顿。后来发生的一件偶然事情让我重新回到那里，比我预想的要早得多。我的一个姐夫罗伯特·霍姆斯拥有一艘行商于波士顿和特拉华之间的帆船。他在费城南面四十英里的纽卡斯尔听到了关于我的消息，就写了一封信给我。信中提到了在我突然出走后，波士顿的朋友们的忧虑，向我保证了他们对我的善意；只要我回去，一切都会如我所愿。他十分真诚地劝我回去。我回了他的信，感谢他的劝告，但是我详尽地陈述了我离开波士顿的理由，让他相信我的出走不是他想象的那样不近情理。

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威廉·基斯爵士当时在纽卡斯尔。当我的信送到时，霍姆斯船主刚巧跟州长在一起，就跟他谈起了我，并把我的信给他看了。州长看了我的信；当他听说了我的年龄时，他好像感到很吃惊。他说我看上去是个有前途的年轻人，应当加以鼓励。他说费城印刷铺的质量十分低劣；假如我在那里开业，他相信我一定会发达。在他这一方面，他愿意设法替我招揽公家的印刷生意，并在其他方面尽力帮助我。这些都是我姐夫后来在波士顿讲给我听的，但在当时我对此一无所知。有一天，当我和凯莫一块儿在窗口干活时，我们看见州长和另外一位绅士。他们衣着华丽，穿过街道径直向我们铺子走过来，接着我们就听到了敲门声。

凯莫立刻跑下楼去，以为是来找他的客人，但是州长要见我。他来到楼上，带着一种我以前不大习惯的谦逊有礼，向我说了许多客套话，希望与我结识，好意地责怪我当初来费城时为什么不让他知道，还邀我和他一起同去酒馆。我陪着州长和富兰契上校来到第三街拐角的酒馆。他一边喝酒一边劝我自己开业，指出我成功的可能性很大。州长和富兰契上校都向我保证他们会利用自己的势力和影响去招揽军政两方面的公家生意。当我提出我不知道我父亲是否愿意在这件事上协助我时，威廉爵士说他会给我一封写给我父亲的信。信中，他会陈述这件事的优点。他确信他一定能说服我父亲。

**格兰特和李：对比研究**

布鲁斯·卡顿

1865年4月9日，当尤利西斯·S·格兰特和罗伯特·E·李在弗吉尼亚州阿波马托克斯县城一所不太大的房子的客厅里会面，商讨李所率的北弗吉尼亚军队的投降条件时，美国人生活中的一个伟大篇章结束了，一个崭新的伟大篇章开始了。此二人实质上终止了内战。他们在拟定投降条件时使用的那间小客厅成了见证美国历史上强烈而戏剧性对照的场所。

这两位同样强大而又迥然各异的将军，分别代表着两股相互对立的力量潮流。通过他们二人，这两股潮流最终碰撞到了一起。

罗伯特·E·李所仰仗的信念是，古老的贵族观念或许能以某种方式继续存在下去，并左右美国人的生活。

李是弗吉尼亚州沿海低地人氏。他的生活背景是家庭、文化和传统……是被移植到这个正在形成自身传奇和神话的新世界的骑士时代。他体现了从骑士和英格兰乡绅时代流传下来的一种生活方式。美国是一个一切从头开始的国度，信奉众生平等、机会平等这样一个颇为模糊的信念。在这样一个国度里，李代表着这样一种情感，即社会结构中保留一种明显的不平等多少有利于人类社会。应该存在一个拥有土地的有闲阶级；反过来社会本身应以土地为本，视其为财富和势力的主要来源。（根据这一理念）这样的社会将造就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阶级；他们不是为自己获利而活着，而是为了承担自己的特权所赋予的重大责任而活着。国家将从他们当中觅得领导人；对于他们，国家能寻求思想、行为、个人举止方面更高的价值观，从而赋予这个国家力量和美德。

格兰特是西部边疆地区一个制革工人的儿子，与李截然不同。他历经艰难才出人头地；他并不代表哪种特别的信念，所体现的只是在边远山区长大的人所具有的永远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品质。他不敬畏或崇拜任何人，过分讲求自力更生；他不追怀既往，但能用敏锐的目光看未来。

这些西部边民和东部沿海低地的贵族恰恰相反。在爬过阿勒格尼山脉、进入辽阔西部的人潮中，存在着对因循守旧的过去深切而绝对的不满。他们拥护民主，并不是因为对人类社会的合理秩序有了理性总结，而仅仅是由于他们在民主的环境中成长的，对民主有着真切的理解。他们的社会或许存在特权，但那是每个人自己赢得的特权。惯例和固有模式一文不值。或许除了拥有一个可以展示自己有多少发展空间的机会之外，没有人生来就享有什么。生活就是竞争。

然而，伴随着这种情感的是对国家的深深的归属感。那些开垦农场、开店或从事贸易的西部人只有在国强时才有希望民富。如果人们前来定居，建立起城镇、公路和近便的市场，他们就能改善自我的状况。他们从国家的命运出发看自身的命运。

而这或许正是格兰特和李之间的最大差异所在。那位弗吉尼亚贵族必然将自己与他生活的地区相联系。他生活在一个几乎容得下一切、惟独容不得变化的静止的社会。出于天性，他的首要忠诚归于这一社会所在的地域。

而那位西部人则以同样的执着捍卫着更为开明的社会观念。他为此而战，因为他所赖以为生的一切与国家同存共亡。面对颠覆联邦的企图，他不可能无动于衷，袖手旁观。他将竭尽所能与之斗争，因为他只能将这一企图视为挖他根基的举动。

因此，格兰特和李两人截然相反，代表着美国生活中两种完全对立的要素。格兰特是初露锋芒的现代人；他身后准备登场的是钢铁和机器的伟大时代，是拥挤的城市时代，是永不满足、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时代。李则手握长矛从古老的骑士时代一路策马奔来，旌旗在头上飘扬。两个人都是各自事业的杰出捍卫者，从所率的民众中汲取长处，同时也承袭了他们的弱点。

然而，存在于两人之间的也不完全是差异。虽然在背景、个性、志向方面有所不同，但是这两位杰出的军人却有着许多共同之处。最根本的是，两人都是优秀的斗士。而且，两人的战斗品质也极为相似。

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是，两人都有在战斗结束后迅速化干戈为玉帛的能力。两人在阿波马托克斯的行事方式带来了和平修好的可能。他们的和谈让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对他们感恩。两位杰出的美国人，格兰特和李，迥然不同却又非常相似。他们在阿波马托克斯的会晤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时刻。

**论幸福**

亚里士多德

在谈过美德、友谊和快乐之后，我们接下来要扼要地谈谈幸福，因为我们把幸福看作人的目的。如果我们先总结一下前面谈过的内容，我们的讨论就会简短些。我们之前说过，幸福不是性情；如果它是，一个一生都在睡觉、过着植物般生活的人，或那些遭遇不幸的人们，也可以算是幸福的了。如果我们不能接受这种说法，并且更愿意像前面说过的那样把它看作是一种活动，如果有些活动是必要的，是因某种其它事物而值得欲求，而有些活动自身就值得欲求，那么幸福就应该算作因其自身而不是因其它某种事物而值得欲求的活动；因为幸福不缺乏任何东西，是自足的。那些除了自身之外别无他求的活动是值得欲求的活动。善行被认为具有这一性质，因为高尚的、美好的行为本身就值得欲求。

令人愉悦的消遣也被认为具有这一性质；我们并不是因为别的事物而选择它们；我们从中受到的伤害要大于获得的利益，因为它们使我们忽视自己的健康和财产。但是，大多数被认为是幸福的人都沉溺于消遣之中。正因为如此，那些精于此道的人在僭主的朝堂上受人推崇；他们投僭主之所好，而僭主也需要这样的人。消遣被认为具有幸福的性质，因为有权势的人都在消遣中消磨时光，但是，这些人或许证明不了什么；因为作为美好活动的源泉，美德和理智并不取决于权势；如果这些没有体验过纯粹且极度快乐的人一味沉溺于肉体的快乐，这种快乐因此也不应该被认为是更值得欲求的；因为儿童也总是把他们看重的东西视作是最好的。正如儿童与成人所看重的事物有所不同，坏人和好人所看重的事物也应有所不同。正如我们多次谈到的，对于好人来说是重要而愉悦的事情才真正是重要而愉悦的。对于每个人来说，与自身性情相符的活动是最值得欲求的。因此，对于好人而言，与美德相符的活动是最值得欲求的。所以，幸福并不在于消遣。如果我们的目的就是消遣，我们一辈子不辞辛劳、忍受艰辛就是为了自我消遣，这也太怪异了。总之，我们所选择的每一件事物，我们都是因为其他事物而选择的，只有幸福除外，因为它就是目的所在。为了消遣而努力而工作似乎是愚蠢而幼稚的。但是，自我消遣是为了努力工作；因为消遣是一种休息。我们需要休息，因为我们不可能不停地工作。所以，休息不是目的，因为我们是为了活动而选择它。

幸福生活被认为是有品德的，而有品德的生活需要努力，它并不在于消遣。我们说，严肃的事情要好于有趣且与消遣有关的事情；任何两件事情（不论是人的两个要素或两个人）中较好的一件，其活动也是更为严肃；但是，较好的一件事物，其活动也更具优势，更具有幸福的性质。

如果幸福是与美德相符的活动，它应该与最高尚的品德相符也就合乎情理了，而这最高尚的品德是我们最好身上最好的品德。其活动就是沉思。首先，沉思是最佳的活动（因为理智不仅是我们的最佳品质，而且理智的对象也是可知对象中最好的）。其次，它最具连续性；与做其他事情相比，我们能更为持续地思考真理。我们认为幸福中含有快乐，但是，哲学智慧的活动被公认是所有有品德的活动中最令人愉悦的。无论如何，追求这种活动被认为可以给人以快乐，而这些快乐因其纯净和恒久而不可思议。我们可以认为，那些拥有智慧的人比那些追寻智慧的人享有更大的快乐。我们所说的自足最应该归属于沉思。虽然哲人，和公正的人或者具有任何其他美德的人一样，需要生活的必需品，但是充分得到这些必需品之后，公正的人需要有人接受他的公正行为并和他一起做出公正行为，有节制的人、勇敢的人以及具有其他美德的人也是如此。但是，即便是独处，哲人也能思考真理。他思考得越深入，他就越有智慧；如果有同道之人，他也许能做得更好；但是，他依旧是最为自足的。沉思似乎是因其自身而被人们喜爱的活动；因为，除了沉思之外，它不产生任何东西；而在实践活动中，我们或多或少从行动中获得某种东西。幸福被认为是取决于闲暇；因为，我们忙碌是为了获得闲暇，发动战争是为了和平相处。

**寻找中国古建筑**

梁思成

在过去的九年间，我参加的中国营造学社经常派出野外考察小分队，由一名资深研究人员带领，在乡间探觅古代遗迹。这种考察每年两次，每次为时两到三个月。我们的最终目标是编撰一部中国建筑的历史，过去的学者实未涉足这一课题。典籍中的材料寥寥无几，我们必须去搜寻实际遗迹。

迄今为止，我们到过十五个省，二百多个县，研究过两千余处遗迹。作为技术研究部门的主管，我得以亲临这些遗迹中的大多数。我们的目标尚遥不可期，但是我们发现了一些极重要的材料，或许普通读者业会对之感兴趣。

欧洲建筑主要取材于石料，与此不同，中国建筑基本上是木构的。这种材料极易受损。纵有砖石建筑，亦以砖或石材模仿木建筑的结构形式。因而，学生的首要任务便是熟悉木构体系，就像研习欧洲建筑之前必先研习维诺拉（意大利建筑师，五柱式建筑的创造者）一样。同样，在野外考察时，学生必须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木结构上。他实际上是在与时间赛跑，因为这些建筑无时无刻不在遭受着难以挽回的损害。在较保守的城镇里，新潮激发了少数人的奇思异想，努力对某个“老式的”建筑进行所谓的“现代化”，原先的杰作毁于愚妄。最先蒙受此如此无情蹂躏的，总是那些精致的窗饰、雕工极俊的门屏等物件。我们罕有机会心满意足地找到一件真正的珍品，宁静美丽，未经自然和人类的损伤。一烛香上飞溅的火星，也可能会把整座庙宇化为灰烬。

此外还有日本侵略战争的威胁，它是如此突如其来，例证了人类的残忍和毁灭性。日本军阀全然不知珍爱与保存古迹。尽管照理说他们的国民也应该和我们一样，对我们古老的文化特别地热爱与尊重，因为这也是他们自己的文化的源泉。早在1931、1932年，日军的炮声一天近似一天，我们的旅行就多次被迫蓦然终止。显然，我们还能在华北工作的时日有限了。我们决定，抓紧最好的机会，竭尽全力考察这个地区。近三年半来，当时这令人难过的预感已成惨痛的事实。目前，营造学社的机构迁至中国西南边陲，北方的土地遭受着敌军铁蹄的践踏，我们的怀念和关注与日俱增，曾经在那里进行过野外考察的记忆愈发鲜活而亲切。

每季出行之前，我们都要在图书馆里认真进行前期研究。根据史书、地方志和佛教典籍，我们选列地点目录，盼望在那里有所发现。考察分队在野外旅行中就依此目录寻访，必须找到与验明目录上的每一条，并对尚存者进行测绘和拍照。

旅行中的寻获和发现极多，其趣味与意义各有千秋。时常，我们从文学典籍中读到某个古代遗迹的精妙景致，但满怀期望地千里朝拜后只找到一堆荒墟，或许尚余零星瓦片和雕石柱础聊充慰藉。

我们的旅途本省同样是心情沉浮不可期的探险。身体的苦楚被视作当然，我们常在无比迷人而快乐地难忘经历中锐感快意。旅途常像古怪的、拖长了的野餐，遇到滑稽而惨痛的麻烦时，或惶急无比，或乐不可支。

不比耗费巨资的考古探险队、追逐狮虎的猎人或任何热带与极地的科学探险队，我们的旅途装备极少。除了测绘和摄影的仪器意外，我们的行囊里，最常见的装备多由队员们根据经验在家自行设计改装而成。像电工包似的旅行背包就是我们最心爱的宝贝。登上一座建筑物任何部位的高处工作时都可以背着它，里面什么都可以装，从一团绳子到可以变成一根刚硬的长钓竿状的伸缩杆。我们尊奉《爱丽丝漫游仙境》里著名的白骑士的哲学，深信在急难中万物皆有用，于是不惜离开马背，以便多运些装备。

日复一日，我们扎营、举饮和食宿的条件悬殊，交通方式亦全无定式，从最古旧离奇到比较现代普通的，无所不有，因此我们认为的必需品莫过于形形色色奇特的、不易破碎的马口铁容器。

除建筑而外，我们常会不期而遇有趣的艺术品或民族用品 --- 各地的手工艺品、偏僻小镇的古戏、奇异的风俗、五光十色的集市，诸如此类 --- 但是，由于胶卷匮乏，我难得随心所欲地拍摄这些东西。我的多数行程都有我的妻子相伴，她也是一名建筑师。此外，她更是作家，深爱戏剧艺术。因此，她比我更会转移注意力，热切地、坚持不惜代价地拍摄某些主题。归程之后，我总是庆幸获得了这些珍贵照片，其中的景色与建筑原本可能被忽略。

**法律与社会**

菲尔·哈里斯

人类社会与动物界存在诸多差异，社会规则便属其一。我们的饮食、睡眠皆有其时，我们的工作也有定时，我们与他人的交往或直接或间接都受到道德标准、宗教教义、社会传统及法律规范的约束。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我们人类生而具有“求偶的本能”，但正是由于社会规则的制约，这一“本能”变成了最常见的受到社会制约的一种关系 --- 异性恋婚姻。婚姻只是社会行为受到约束的一个例子而已。法律规则在商务界尤为重要，诸如银行业、金钱、信贷、就业等事务无一不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法律的制约。的确，在我们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已经很难找到独立于法律的领域。诸如驾驶、工作、为人父母、处置房产等活动均在某种方式上受到法律的影响。即便像饮食之类的基本活动都间接地受到法律的影响，因为按照法律的要求，我们所吃的食物必须达到干净、卫生、甚至商品描述等这些严格标准。

如果要求给法律下定义，我们大多数人可能会用规则这个词。规则规定了何种行为能够、应该或者不应该发生，或指某种行为应当以特定的方式进行。法律规则或许会禁止某种行为的发生 --- 如刑法规则禁止凶杀和盗窃 --- 法律规则或者会强加某些条件，在此类条件下某种行为方可发生。再者，法律包含一些我们可以称为“赋予权力”的规则：这些规则允许某些行为的发生并得到某种形式的法律上的支持与保护。因为规则引导我们可以做什么，必须做什么或者限定什么不能做，所以，规则被认为是规范性的。如果我们将规范性的陈述与事实性的陈述相对照，我们便能够更好地理解该词的意思。规范性的陈述告诉我们何事应当发生，事实性的陈述告诉我们何事已经发生。所有的规则，无论是法律的、道德的、甚至是习俗的都是规范性的。它们制定了我们应当遵守的行为标准，假如这些规则影响我们的话。

大体上看，规则，尤其是法律规则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服从规则的现象，以及接受这些规则是合法的、权威的。关于这些问题有很多分析，让我们粗略地考察其中的一两条。例如，奥斯丁关于人们为何遵守法律的原因可在其观点中得到解释：人们“习惯服从”一个社会的主权机构，以及无处不在的惩罚的威胁能解释人们对法律的服从。然而，鲜有人认为以上的解释有充分的依据。认为人们处于习惯或畏惧官方的打击报复而遵守法律，这是一个值得怀疑的假设。相反，哈特认为，大多数人遵守法律是基于更加复杂的社会与心理过程。哈特认为人们遵守法律是因为一些内在的心理倾向我们才会认为遵守法律是“正确与适当的”。哈特将这种接受现象称为对法律“内在的”服从，并且认为人们是出于这样的一种接受才遵守法律。

当然，哈特也承认有些例外。一些人遵守法律或许出于对违背法律的后果的担心。另外一些人或许并不赞同这个社会中法律与社交的全部约定，但是他们纯粹出于便利而遵守法律。当然，所有的事情都取决于我们所讨论的社会种类与法律体系，因为残暴极端的政权可能恐吓民众服从其指令。然而，在我们这个社会，很少有人会质疑这个观点：大多数人都接受如宪法章程与原则所界定的现存的法律、社会与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以及我们日常对法律权威的常识上的认识。

然而，我们社会的权威概念值得密切关注。社会学家麦克斯· 韦伯将社会团体的权威分为三类。首先，他认为一个领导或统治者的权威或许源于领导的个性特点 --- 他或她的个人魅力 --- 使得此人与众不同。诸如此类的例子如耶稣基督、拿破仑、或阿根廷的伊娃·贝隆或英国的丘吉尔，或者可以这样说，所有的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或在不同程度上因其不同凡响的强烈个性而上升到一个崇高的地位，并且保持了他们作为领袖的地位。

韦伯认为，第二种权威是传统意义上的权威，人们服从领导或政权是基于传统的理由，“因为历来如此。”第三，韦伯认为当代西方社会还有一种他称为理性-法律或官僚政治的权威。这种政权权威的合法性不依赖于有个人魅力的领导，也不靠单纯的传统，而是靠规则与程序。韦伯的三种权威类型很少以纯一种的形式在现实中存在，大多数社会都有超过一种类型的权威。我们的社会有这三种类型的特点 --- 传统式的（如正式的议会开幕式），个人魅力式的（如二战期间丘吉尔的领导）以及理性-法律式的（如官僚政治与法律机构的行政部门）。

**我们失去的世界**

詹姆斯·古斯塔夫·斯佩思

全球有一半的热带和温带森林已经消失。热带森林继续以每秒一英亩的速度遭到砍伐。约有一半的湿地和三分之一的红树林已经不复存在。根据估算，90%的大型掠食性鱼类已经消亡，75%的海洋鱼类遭到过度捕捞或已经达到捕捞极限。20%的珊瑚已经消失，另有20%受到严重威胁。物种消亡的速度比正常高出千倍。自恐龙灭绝后6500万年来，地球从未目睹过如此快的物种消亡速度。在较干旱地区，超过半数的农业用地都出现一定程度的退化和沙漠化的现象。如今，我们每一个人的体内基本都能查出持久性有毒化学品。

目前来看，人类的影响超过了自然系统的承受能力。地球的平流臭氧层在严重消退之后才被人们发现。人类活动是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升高超过30%，并且已经开始导致全球气温升高，扰乱气候规律。地球上的冰原正在融化。工业过程的固氮作用使氮具有生物活性，其速度与自然界的速度相等。其中的一个后果就是导致海洋因富营养化而出现200多处死区。人类活动每年要消耗或破坏自然界约40%的光合产物，剩下的不足以供给其他生物。1960年至2000年间，全球淡水资源萎缩面积翻了一番，目前已占可利用径流量的一半以上。科罗拉多河、黄河、恒河、尼罗河等河流在旱季时出现断流，无法流入大海。

人类社会在不断显现的灾难中前行，脚下的道路连接着两个世界：身后是我们已经失去的世界，而前方的世界正在由我们创造。

我们很难感知失去世界中那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在美国，我们能够想起1491年的前哥伦比亚时代，想起刘易斯和克拉克的远征，还有约翰·詹姆斯·奥杜邦的作品。那是一个自然面积广阔但是人口稀少的世界。壮观的原始森林从大西洋沿岸延伸至密西西比河流域。海洋中生活着大量的鱼类，成群的鸟儿飞过蔚蓝的天空，数量之多皆可蔽日。根据威廉·麦克利什在《美国前传》中的记录，1602年一个英国人在日记中描写了自己在海上看到黑压压的一大群鱼，还以为是海底呢！野牛曾向东迁徙至佛罗里达，东南地区有美洲虎，中西部有灰熊，新英格兰地区生活着狼、麋鹿和美洲狮。

奥杜邦描述了旅鸽迁徙的壮观景象以及被其他动物和人类捕杀的场景：“太阳落山前，见不到几只鸽子；但是很多人已经备好了马车，带上枪支弹药，安营扎寨……突然传来一声齐喊‘它们来了！’鸟扇动翅膀的声音还很远，却让我想起了海上刮起的狂风……鸟来了，嗖嗖地掠过我的头顶，让我一惊。很快上千只鸽子被挥杆子的人打下来，但鸟的阵容还在不断扩大……成千上万的鸽子飞来，争先恐后地落在地面上，到处都是挤满了周边的每棵树……喧嚣持续下去……整整一个晚上……天明之前，喧闹声减退……现在狼的叫声传入我们的耳中。我们看见狐狸、山猫、美洲狮、熊、浣熊、负鼠、臭鼬偷袭鸽群。与此同时，一群秃鹰跟着不同种类的鹰和隼前来赶走那些动物，享受战利品。就在这时，这场浩劫的制造者开始进场。周围的鸽子要么已经死去，要么垂死挣扎，要么严重受伤。鸽子被人捡起，丢成一堆，直到那人再也拿不动为止。这时，人们放出公猪，让它们吃掉剩下的鸽子。”

1914年，世界上最后一只旅鸽在辛辛那提的一家动物园死亡。几十年后，林业专家兼哲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在这只鸽子的纪念会上说道：“我们之所以悲伤，是因为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再次目睹胜利的鸟儿排成队向前冲去，在三月的天空中用翅膀为春天开辟道路，把冬天从林间和草原的各个角落赶走……尚且活着的人记得童年时看到的鸽子，尚且活着的树木曾在幼年被风般的展翅惊扰……鸽子将永留纸间和博物馆里，但它们都是以塑像和图画的形式存在，对一切苦难和一切欢笑都无动于衷。书中的鸽子不会从云间俯冲下来，惊得小鹿慌忙躲避，也不会扇动翅膀，回应橡果林中那喝彩般的雷鸣。书中的鸽子不会将明尼苏达州新割的麦穗当早餐，也不会将加拿大的蓝莓当晚餐。它们不懂得季节交替，感受不到阳光的亲吻和风雨的吹打。”

人类社会正在这两个世界之间快速穿行，起初的速度并不快，但现在我们正奔向正前方的世界。诚然，旧的世界 --- 自然界的世界 --- 仍在延续，可我们却在不停地将其喊停、孤立。在艺术、文学和我们的想象中，它有着勃勃生机，而在现实中，它正在离我们而去。

**娱乐至死**

尼尔·博斯曼

美国的电视节目在全世界供不应求。美国电视节目的出口量大约为10万到20万小时，平均分布在拉丁美洲、亚洲和欧洲。在过去若干年中，像《荒野大镖客》、《宝藏》、《碟中谍》、《星际旅行》、《侦探科杰克》以及最近的《达拉斯》和《豪门恩怨》这样的节目在美国、日本、以色列和挪威的受欢迎程度，绝不亚于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与此同时，美国的道德和政治威信在全世界范围内大大下降了。美国的电视节目之所以供不应求，并不是因为人们热爱美国，而是因为人们热爱美国的电视。

要想弄清楚个中缘由，其实并不困难。在看美国电视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想到萧伯纳第一次看见百老汇和四十二大街上夜间闪烁的霓虹灯时发出的精彩评论。他说，如果你不识字，这些灯光无疑是美丽的。美国的电视确实是美丽的奇观，是难得的视觉愉悦，每天都倾倒出上万个图像。电视上每个镜头的平均时间是3.5秒，所以我们的眼睛根本没有时间休息，屏幕一直有新的东西可看。而且，电视展示给观众的主题虽多，却不需要我们动一点脑筋，看电视的目的只是情感上得到满足。就连很多人都讨厌的电视广告也是精心制作的，悦目的图像常常伴随着令人兴奋的音乐。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世界上最美的照片是出现在电视广告里的。换句话说，美国电视全心全意致力于为观众提供娱乐。

当然，认为电视具有娱乐性，这实在是太老套了。这样的事实不会对文化造成任何威胁。这或许甚至是值得欢庆的理由。我们经常说，生活不是铺满鲜花的阳光大道，能在途中偶尔看见一些花朵，会使旅途变得不那么难以忍受。但我在这里想要说的不是电视的娱乐性，而是电视把娱乐本身变成了表征一切经历的形式。我们的电视使我们和这个世界保持着交流，但在这个过程中，电视一直保持着一成不变的笑脸。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我们可以换种说法：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不管是什么内容，也不管采取什么视角，电视上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提供娱乐。正因为这样，所以即使是报道悲剧和残暴行径的新闻节目，在节目结束之前，播音员也会对观众说“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为什么要再见？照理说，几分钟的屠杀和灾难应该会让我们整整一个月难以入眠，但现在我们却介绍了播音员的邀请，因为我们知道“新闻”是不必当真的，是说着玩的。新闻节目的所有一切都在向我们证明这一点 --- 播音员的姣好容貌和亲切态度，他们令人愉快的玩笑，节目开始和结束时播放的美妙音乐，生动活泼的镜头和绚丽夺目的各类广告 --- 这一切都告诉我们，没有理由为电视上的不幸哭泣。简单地说，新闻节目是一种娱乐形式，而不是为了教育、反思或净化灵魂，而且我们还不能过于指责那些把新闻节目作此定位的人。他们播报的新闻不是为了让人读，也不是为了让人听，他们的新闻是让人看的，这是电视自身所指引的方向，他们必须遵循。这里没有阴谋，没有智力欠缺，只有坦白的观点：“好电视”同用于陈述的语言或其他口头交流形式无关，重要的是图像要吸引人。

电影、唱片和广播都以娱乐为目的，它们在改变美国话语风格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但电视和它们不同，因为电视包容了话语的所有形式。没有人会为了了解政府的政策或最新的科学发现而去电影院，没有人会为了了解棒球赛的比分或天气情况或最近发生的谋杀案而去买唱片，没有人为了听肥皂剧或总统演讲而打开收音机（如果他的头上还有一台电视机的话）。但是任何人都可以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切，甚至更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电视对于文化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冲击力。电视是我们文化中了解文化的最主要方式。于是 --- 这是关键之处 --- 电视中表征的世界变成了这个世界应该如何存在的模型。娱乐不仅仅在电视上成为所有话语的象征，在电视下这种象征仍然统治者一切。就像印刷术曾经控制政治、宗教、商业、教育、法律和其他重要社会事务的运行方式一样，现在电视决定着一切。在法庭、教室、手术室、会议室和教堂里，甚至在飞机上，美国人不再彼此交谈，他们彼此娱乐。他们不交流思想，而是交流图像。他们争论问题不是靠观点取胜，他们靠的是中看的外表、名人效应和电视广告。